

# 晋商文化传承与区域经济转型

## ——传统休闲模式对山西大众体育产业的驱动效应研究

□朱磊

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探讨晋商文化传承与区域经济转型的互动机制,聚焦传统休闲模式对现代体育产业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山西长期面临“结构性资源依赖”与“文化动能断层”的双重困境,导致经济抗风险能力薄弱,文化资源的经济转化效率低下。文章提出了西方理论在解释本土实践时的局限性,提出基于费孝通“差序格局”与晋商“义利观”的本土化理论框架,揭示晋商文化通过空间差序、伦理差序与关系差序三重机制驱动体育产业创新。实践层面,提出三级差序开发策略、混合所有制改革及数字赋能路径,旨在破解“资源诅咒”,推动文化基因向产业动能转化。研究为资源型地区通过文化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范式与中国方案,亦为“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贡献山西经验。

**关键词:**差序格局;晋商文化;区域经济转型;传统休闲模式;体育产业;文化资本;协同治理;数字赋能

### 双重困境:结构性资源依赖与文化动能断层对经济转型的阻滞效应

山西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明重镇,其深厚的晋商文化遗产与独特的传统休闲模式曾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活力。然而,在当代工业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山西正面临经济结构失衡与文化传承危机的双重挑战。

#### 一、现实矛盾的深度解析

山西省作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长期依赖煤炭产业支撑经济发展。2022年,山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占GDP比重仍高达64.06%,而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0.8%,其中体育产业规模不足1.5%。这种“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不仅加剧了生态环境压力(粗放开采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全省采空区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率高达69%),更导致经济抗风险能力低下,能源价格波动直接冲击经济稳定性。2014年,山西GDP增速4.9%,全国倒数第一,同期煤炭价格大幅下跌,重点煤企利润降幅近七成;2024年山西GDP增速2.3%再次垫底,而内蒙古因多元产业支撑以5.9%增速反超山西。新兴产业的规模不足,难以对冲传统产业衰退,使山西陷入“资源诅咒”的泥淖。与此同时,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的目标,山西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亦将“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680亿元”列为重点任务,政策红利的释放为山西经济转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然而,山西经济转型面临深深文化矛盾。晋商文化作为中国三大商帮文化之一,其“信义为本、群体协作”的伦理精神曾缔造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商业传奇。但当代晋商文化转化严重滞后,一方面,传统休闲模式与现代体育消费需求脱节:形意拳、挠羊赛(传统摔跤)等非遗项目虽被列入国家级名录,却因缺乏创新性开发而困守乡土,难以转化为现代体育消费动能;另一方面,晋商文化符号的产业化利用浮于表层,多数项目止步于博物馆展示或节庆表演,未能形成可持续的产业生态。例如,山西太谷(国际)形意拳交流大会,从2008年到2024年的第七屆赛事里,每届平均参赛人数不足600人,赛事年均吸引游客不足万人次,远远低于同期平遥古城游客量(仅2018年超1500万人次),文化资源的经济转化效率低下。这一矛盾折射出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普遍困境:如何在“去资源化”过程中激活本土文化基因,将非物质遗产转化为产业创新动能?山西的实践表明,单纯依赖传统能源替代或技术引进难以突破路径依赖,而体育产业作为绿色经济与健康消费的结合点,或可成为破解困局的关键切口。

#### 二、理论解释的局限性

既有研究在解释山西困境时呈

现显著的适配困境。西方理论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强调个体通过教育投资积累文化资源,却难以解释晋商“伙东制”中“银股”(资本股)与“股身”(技术股)混合的产权逻辑。乾亨记合约是晋商票号身股制的重要实证,学界公认其最能反映票号合伙及身股制的实质。合约为明确约定:“武日中人力作为一俸,其余诸伙人力股俸不齐,人股齐支每俸以二百五十(两)”。此处“人力股俸”即身股,其份额根据员工职级与贡献差异分配。身股无需出资,仅凭人力资源获取分红资格,且分红权与票号经营周期绑定,需待账期结束后按股银比例分配。这种“能力确权”机制本质是群体共享的文化资本分配模式,与布迪厄的个体竞争假设根本冲突。在当代实践中,这种冲突体现为西方理论对晋商后裔协会运作的误读:某国际研究团队将山西形意拳协会的师徒传承网络简单归类为“社会资本”,却忽视其“非血缘准入”特性——通过严格的武德考核,外姓弟子亦可获得核心技艺传承。例如,形意拳传承人史海宝(非血缘弟子)师从布华轩(车派布式形意拳第三代传人),经过近50年的学习与实践,成为太原市形意拳协会原副主席。其经历表明,传承资格并非由血缘决定,而是通过拜师学艺、德行考核与技艺精进获得。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聚焦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却忽视晋商“标期制度”中伦理规范的刚性作用。晋商推崇“和为贵”的理念,深信“和气生财”。晋商将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强调与“相与”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始至终保持良好,共同面对困难。在商业交易中,他们不以价格为唯一考量,而是注重友好合作。一旦发现对方有欺诈行为,他们将断绝往来,永不复交。这种“伦理驱逐”的惩罚力度远超关系断裂本身,形成独特的“道德市场”治理模式。而现代山西体育产业的实践表明,伦理约束依然深刻影响经济行为:2017年太原马拉松赛事中,某酒业公司自称是赛事赞助商,因诚信问题,虚假宣传,非法牟利,损害赛事声誉,被组委会依法追责。此后六年内再无本土大型赛事与其合作。这种基于声誉的惩戒机制,难以用格兰诺维特的“弱连接优势”理论解释,却与晋商“信义即资本”的逻辑一脉相承。

本土研究则陷入历史考据与对策研究的割裂。学者们对晋商票号制度、商路网络进行了精湛的史料梳理,却鲜少将其置于现代转型语境中考察。例如,对“相与制度”的研究多聚焦清代伙伴选择标准(如“重信守诺、资本雄厚”),却未能揭示其对现代产业集群协同机制的启示——山西太谷(国际)形意拳交流大会前四届与中远威药业合作办赛的模式,本质上是对“相与”信任网络的现代复现。政策建议常陷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陷阱:张壁古堡的传统射箭比赛虽结合古堡文化,但景区主要通过赛事吸引游客消费,而非系统性推广射箭文化的历史内涵。文旅项目中,历史街景或建筑被斥资复制,但文化内涵被抽离,仅作为游客消费场景。若现代项目仅模仿建筑形式而忽视文化精神(如票号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则与历史初衷背道而驰。这种理论贫血使得“传统休闲如何驱动现代体育产业”这一核心问题,至今缺乏系统性解释框架。

### 差序驱动:晋商文化因向体育产业动能的三重转化机制

山西的转型困境不仅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象,更是文化逻辑与现代化进程断裂的深层映射。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从晋商文化的核心基因中提炼理论工具,重构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结合张正明的“晋商义利观”,构建一套扎根本土实践的解释框架。

#### 一、理论工具的本土化选择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最

初用于阐释中国乡土社会“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延”的关系网络特征。在晋商文化的现代转化中,这一理论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张力。晋商的商业网络本质上是一种差序化结构——从总号到分庄的层级布局,从“相与制度”的信任筛选到“标期制度”的伦理约束,均体现差序逻辑对经济行为的深刻形塑。这种逻辑与现代体育产业的圈层化发展存在深层契合,为理论重构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空间。

空间差序的现代转化,体现为“核心——边缘”资源整合逻辑的延续与创新。晋商票号的“总号(山西)——分庄(蒙俄江南)”体系,通过核心决策与边缘执行的协同,构建起跨区域的商业帝国。例如,山西太谷北洸村曹家在清道光年间于张家口设立“锦泰亨票号”作为总号,并依托张家口这一贸易枢纽向蒙古和俄罗斯扩展业务。曹家通过张家口向北贩运茶叶、丝绸至恰克图(中俄贸易关键节点),并在蒙古草原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设立分庄,形成了覆盖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的金融网络。这种空间布局的现代复现,体现为山西体育产业的“核心城市(太原)——县域(晋中)——村落(太谷)”三级圈层结构。太原作为核心枢纽,赛事运营经验被提炼为标准化模板。地方城市作为次级节点,依托太原的核心资源,承接标准化赛事模式。地方赛事通过标准化复制实现规模化效益。

关系差序的现代实践,则聚焦于信任网络的再生产与协同治理。晋商“相与制度”中基于地缘、业缘的信任筛选机制,演化为现代体育产业链的“政府—协会—企业”协同模式。以太原马拉松为例,太原市政府统筹交通管制、安全保障及财政补贴,例如2024年赛事获市级财政拨款2000万元用于赛道升级和宣传。山西省田径协会负责赛事技术标准的制定,并联合高校科研团队开发智能裁判系统,提升赛事公平性。中体产业集团负责赛事招商和品牌推广,引入李宁、特步等赞助商,2024年直接经济收益达1.71亿元,并通过“体育消费周”活动带动周边产业消费3.41亿元。三方签订5年合作协议,明确责任分工与收益共享机制,合作续约率达85%,且赛事运营成本较纯市场化模式降低30%。

张正明提出的“晋商义利观”,则为现代体育经济行为提供了伦理坐标系。“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塑造了品牌战略的长期主义逻辑。九牛牧业自2017年起连续冠名太原国际马拉松(太马),长期冠名投入规模较大。九牛牧业的品牌曝光通过赛事规模、媒体传播及衍生消费活动实现了高效转化。2024年太马参赛人数达4万人,报名峰值超12万人,央视直播覆盖全国,并同步在爱奇艺、优酷等平台传播。2024年赛事配套“体育消费周”活动,发放1000万元消费券,吸引参赛选手及未中签跑友超12万人参与,直接拉动消费1.71亿元,间接消费3.41亿元。这种“以义蓄势”的策略,与西方品牌赞助的短期流量思维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伦理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累积效应。“群体本位”的产权逻辑则启发混合所有制改革。汾酒集团在2018年引入华润旗下华创鑫睿(持股11.45%)作为战略投资者,形成“国有控股+民资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尽管未直接涉及“技艺股”,但其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骨干授予股权,实现了“国有资本+市场化资本+人才技术资本”的融合。混改后,山西汾酒营业收入增长至2017年的3倍,销售净利率从14.56%提升至26.99%,省外市场

拓展显著加速。

#### 二、晋商文化驱动的三重机制

空间差序机制的核心在于层级化的资源整合逻辑。历史上,晋商票号通过“总号决策一分庄执行—商路联动”的体系,实现跨区域资源流通。以祁县乔家大院的大德通票号为例,总号设于山西,分号遍布包头、汉口、北京、上海等地,依托商路网络调配资金与货物。现代体育产业复现了这一逻辑。

综合体作为“现代总号”,承担技术标准输出、数据中枢监控与品牌协同管理职能。太原市体育局主导的“锦绣杯”系列赛事涵盖足球、篮球、羽毛球等多个项目,覆盖全年龄段人群,2024年共举办7500余场活动,辐射近50万人。其标准化赛事设计被复制到晋中、吕梁等地,地方赛事通过标准化复制实现规模化效益。

伦理差序机制的运作依赖于道德规范的市场化内嵌。晋商“标期制度”要求商号按季结算,违约者被永久逐出商业网络。这种伦理传统转化为现代信用治理体系:2023年10月,平遥县市场监管局对“望古楼客栈”因“拒不履行价格承诺”立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其按原价履行消费者承诺。平遥古城通过“示范经营户”认证和信用承诺书机制,将晋商传统的信用治理转化为现代市场监管工具,其核心逻辑与标期制度一脉相承。消费层面的伦理形塑同样显著,形意拳“尚德不尚力”的传统推动健身偏好从竞技性转向养生性。太原市“逸养时光”康养中心成立形意拳传习基地,推广养生功“八段锦”“易筋经”等课程,吸引市民参与。挂牌仪式上,形意拳协会主席邵建功强调“弘扬传统武术以收获健康”,推动健身偏好从竞技转向养生。通过展示传统套路和养生功法,提升了市民对形意拳的认知度,促进健康消费需求。

关系差序机制的效能体现在非正式网络的产业赋能。晋商“相与制度”中的长期合作信任,促使现代体育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山西太谷国际形意拳交流大会历届赛事中,大会以企业或机构冠名形式体现赞助关系,前四届赛事均为本土企业山西中远威药业有限公司冠名的“中远威杯”。这种稳定性源于差序化合作网络——组委会优先选择晋商后裔企业,并通过信用互保降低风险。

社群参与创新则体现为治理结构的文化适配。借鉴晋商文化治理的“公议制”模式,例如社会力量认养文物需遵循“政府指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机制,体现多方共治。山西在乡村振兴中推动非遗与社区经济结合,如临汾市通过非遗数据库和直播带货推广非遗产品,形成“保护—传播—收益”闭环。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初步形成。

#### 三、对西方理论的回应

西方理论在解释晋商文化实践时遭遇的困境,凸显本土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强调个体通过教育、惯习积累资源以获得阶层优势,但其个体主义倾向无法解释晋商文化的群体共享特性。本研究提出“差序型文化资本”概念,定义为以伦理认同为基础、通过差序网络实现群体共享的非物质资源集合。其核心特征具有突破血缘壁垒开放性,如形意拳协会通过武德考核向非遗弟子开放核心技艺,也具有资源沿关系链扩散流动性,晋商后裔企业共享客户资源与供应链;同时其亦兼有伦理约束的特征,使用权与道德表现挂钩,失信企业被剥夺品牌使用权。2023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0.9%,营业收入利润率提升至8.93%,部分得益于行业规范和政策支持。这一概念不仅修正布迪厄理论的个体化局限,更揭示中国社会“关系本位”文化资源的独特转化路径。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聚焦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软性约

束,但晋商实践表明,伦理规范具有刚性强制力。本研究提出“伦理性嵌入”概念,其运作机制既包括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进行量化评估和道德认证,又包含严重违规者被永久排除在合作网络之外伦理驱逐。实证案例显示,2019年,东莞市中堂金蟾运动用品厂因违法使用5名童工被东莞市人社局列入“黑名单”。人社部门责令其整改并作出行政处罚,企业随后清退童工。被列入黑名单后,企业面临信用惩戒、合作方终止合作等压力,最终可能因声誉受损和经营受限导致市场退出;在2024年太原马拉松中,多名选手因伪造号码布、替跑等违规行为被处罚,包括取消成绩、禁赛两年等。尽管处罚对象为参赛者而非赞助商,但组委会通过公开处罚公告强化赛事伦理标准,维护赛事声誉。组委会对违规行为的公开处理,间接向赞助商传递“伦理优先”的信号,与赞助商审查机制形成互补。这种“伦理高于利益”的治理逻辑,与西方理论中“关系断裂可修复”的假设根本不同,揭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伦理维度。

#### 四、理论重构的价值

通过差序格局的本土化重构,晋商文化研究从历史考据跃升至理论创新层面。“差序型文化资本”与“伦理性嵌入”的概念体系,不仅破解西方理论的解释困境,更构建起非西方中心的文化经济学范式。在此过程中,理论重构与产业实践形成双向滋养:文化逻辑为经济转型提供价值锚点,而市场机制为文化传承开辟生存空间。这种互动关系,或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刻的文化密码。

### 协同创新:文化治理与数字赋能下的区域转型实践路径

#### 一、三级差序开发策略

核心城市的文化枢纽功能需强化资源集聚与技术辐射能力。太原作为晋商文化现代转化的核心引擎,应建设“晋商体育服务综合体”,集成研发、赛事、培训三大功能。研发中心重点开发武术动作数据库与虚拟现实(VR)体验项目,例如运用AI技术复原清代镖师走镖场景,游客可通过VR设备沉浸式体验茶马古道的商旅艰辛。赛事平台需创办“晋商之路”国际徒步挑战赛,串联平遥古城、太行山挂壁公路等历史与自然景观,吸引专业人才参与,带动沿线村落旅游收入增长。培训基地则需联合山西大学等高校开设“非遗体育经理人”认证课程,课程内容涵盖晋商契约文书解读、传统武术IP运营等,毕业生就业率高,填补了文化管理人才缺口。

县域节点的特色IP开发需立足文化特质与产业联动。县域节点的特色IP开发需立足文化特质与产业联动。晋中祁县以镖局文化为核心,可设计“古驿道定向越野+数字押镖游戏”融合产品。参与者沿明清古商道徒步,通过AR技术接收虚拟押镖任务,完成任务可获得“晋商信用积分”,兑换当地非遗产品折扣。忻州则需依托“挠羊赛”非遗,延伸摔跤主题产业链。例如打造摔跤主题民宿,在客房内布置跤衣、跤场沙盘,并提供专业教练指导体验课程;开发格斗主题餐饮,将传统饮食(如荞面碗托)命名为“大力跤王餐”,形成“观赛一体验—消费”闭环。

村落基底的内生动力激活需重构社群参与机制。平遥洪洞等村落可实施“社火重生计划”,将高跷、秧歌等传统表演改编为健身舞蹈。例如洪洞通背拳村落将高跷技艺与核心肌群训练结合,设计“平衡挑战赛”,纳入乡村文化站日常活动,鼓励全民参与,收益共享机制需设立“非遗红利基金”,规定体育旅游收入的30%反哺村落基建与传承人津贴。

#### 二、制度创新的文化适配性设计

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平衡文化价值与市场效率。借鉴晋商“伙东制”的产权逻辑,可设计“政府土地入股+民资运营+传承人技术持股”模式。例如在筹划晋中形意拳小镇

开发项目中,政府可以土地作价入股,民企注入资本,传承人持“技艺股”。三方按股比例分配收益,门票收入的一定比例分别用于运营,民企收入,政府收入(用于周边基建)和传承人津贴。此外,可推广“绩效股权”制度,将非遗传承人的技艺贡献量化为企业股权。例如太原某体育公司对研发形意拳VR课程的教练可授予一定比例的股权,核心团队离职率就会下降,产品迭代速度就会提升。

文化伦理审查制度需守护转型的价值底线。可以设计成立“晋商文化转型专家委员会”,由历史学者、非遗传承人、法律专家组成,制定《山西省非遗活态利用伦理指南》。对文旅项目需通过历史真实性评估,例如镖局主题项目必须还原晋商契约中的分红条款、风险共担机制等细节。此类审查机制可有效防止文化异化,确保商业开发不背离伦理传统。

#### 三、风险防控与可持续发展

文化异化预警体系需建立量化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可构建“非遗项目商业化健康指数”,包含游客投诉率、文化符号误用频次、传承人满意度等指标。例如设定投诉率超过一定比率或符号误用月均超次数后即触发黄灯预警,相关部门则需在若干工作日内介入整改。同时,需建立“文化修复基金”,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受损非遗项目的抢救性保护。

数字技术赋能需聚焦文化确权与体验升级。区块链技术可用于形意拳传承谱系与晋商契约的确权存证。洪洞县已将传承人的师承关系、古代契约上链,实现传承脉络的不可篡改与收益追溯。若出现侵权,区块链存证快速锁定侵权方,案件处理周期将大大缩短。元宇宙场景则可构建“虚拟晋商票号”,用户注册后领取虚拟汇票,通过完成信用任务(如按时兑付、诚信交易)积累文化积分,积分可兑换实体权益(如古城门票折扣、非遗工坊体验)。参与用户在票号知识测试中提升认知,文化传播效率显著提高。此外,AI技术可辅助非遗活化——山西艺术家利用AI图像生成技术,将古建筑(如五台山、鹳雀楼)转化为剪纸作品,输入“中国风剪纸”“非遗”等关键词后,AI快速生成兼具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设计。创作周期从数周缩短至几十秒,作品在春节期间引发广泛传播,线上展览浏览量超百万次,带动古建文化认知度提升45%。衍生文创产品(如数字藏品、定制明信片)通过电商平台销售,非遗经济价值增长30%。

#### 结语

晋商文化传播与区域经济转型的深层互动,揭示了一条以传统休闲模式驱动现代体育产业的特色路径。通过形意拳、挠羊赛等传统休闲活动的创造性转化,山西正将文化基因转化为体育经济动能,为资源型地区突围“能源依赖—文化失活”困境提供了实证范本。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文化符号移植,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伦理审查机制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系统性重构,确保传统文化在与市场经济的碰撞中守住根脉、激发活力。

山西的实践表明,当高跷秧歌转型为健身舞蹈、当晋商票号演变为元宇宙信用课堂,传统休闲模式完全能够突破代际断层的桎梏,成为大众体育消费的新载体。这种驱动效应不仅体现在体育产业GDP贡献率的提升(晋中市已达4.2%),更在于重构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青年返乡率增长、非遗传承人收入提升、文旅融合业态创新,共同勾勒出资源型地区“去煤炭化”转型的文化答卷。未来,随着“差序型文化资本”理论的深化与跨区域协同机制的完善,晋商文化驱动的转型经验或可沿黄河流域扩散,为更多亟待破解“资源诅咒”的地区提供文化经济学的中国方案。

[本文系山西省社科联2024至2025年度重点课题,课题编号:SSKLZDKT2024056]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山西太原030051)